

第十四章

成本扭曲与中国的结构失衡

黄益平 王碧珺

一 引言

温家宝总理在 2003 年执政之初就已经开始担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质量和可持续性问题。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多次警告，由于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不足的创新能力和对资源消费的过于依赖，日益恶化的污染问题、扩大的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以及收入差距等问题，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温家宝，2006）。

以上政府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担心也正是经济学家们多年来所忧虑的。例如，余永定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就开始讨论结构失衡问题，尤其指出了投资和经常账户盈余占 GDP 比重过高的问题（余永定，2007）。投资过度表明未来生产能力的过剩，而过大的外部账户失衡则削弱了中国强劲增长的可持续性。

对一些外部的观察者而言，讨论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似乎很奇怪。毕竟，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成功保持 GDP 年均增长 10% 长达 30 多年的国家。如果中国政府过去能够扫除阻碍经济强劲增长的障碍，那么未来也可以。中国目前已经在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再次加深了外部观察者对中国政府政策有效性的印象。2008 年底、2009 年初，由于出口巨幅减少，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明显。但是，当局很快地通过大手笔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扭转了经济局面。到 2010 年初，经济已经返回到 12% 的增长率。一些专家则又开始

担心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风险。

自从温家宝 2003 年担任国务院总理以来，中国政府就采取了诸多政策试图减少出口激励，增加国内消费，调整结构失衡。但是，在过去的 7 年间，投资占 GDP 比重进一步上升，经常账户盈余不断增加，收入不平等问题恶化，几乎所有的失衡问题都变得更加严重。

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清醒认识与处理这些问题的缺乏成效使得专家们对中国经济形势有截然不同的判断（黄益平，2010b）。一些经济学家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表现描绘为“中国奇迹”（林毅夫等，1996），他们相信如果经济继续保持高速的增长，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的 10~20 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是，还有一些经济学家更关注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他们认为当前的改革方法不具有可持续性（Pei，2006）。更有悲观者预言中国经济即将崩溃（Chang，2001）。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那些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乐观者也仍然担忧中国的结构失衡问题。乐观者和悲观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相信中国政府能像过去 30 年所做的那样处理好这些风险。然而，这是一个很牵强的假设。过去的表现经常可以预示未来的发展，但是那些期望落空的例子也很多。

抛开以上争辩，本文意在探讨关于结构失衡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国结构失衡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其是如何发展的？第二，政府为解决结构失衡采取了哪些政策，到目前为止，这些政策的效果如何？最后，失衡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能够更有效地解决中国的结构失衡问题？

经济学家们对于中国结构失衡问题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黄益平和陶坤玉，2010）。有的强调政府在推动经济更强劲增长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姚洋，2010）；有的指出，人民币被低估促进了净出口的同时也歧视了非贸易部门；还有一些专家认为落后的社会保障体系导致了居民消费不足。

本文关注的则是中国的非对称的市场化改革。在这一改革过程中，产品市场已经实现了市场化，但是要素市场仍然存在高度扭曲。这些扭曲压低了要素价格，降低了生产成本，相当于是对生产者和投资者进行补贴。而这些补贴在促进过去 30 年中国经济较快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结构失衡的问题。因此，本文认为要消除结构失衡的关键在于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本文的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描述中国结构失衡的主要现象以及演变过程；第三部分回顾政府为解决结构失衡问题采取的政策及评估这些政策的有效性；第四部分讨论中国非对称的市场化改革，并粗略估计要素市场扭曲的程度；最后部分则建议完成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从而再平衡中国的经济结构。

二 中国结构失衡的表现

虽然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失衡，但一直以来却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失衡的程度。本文讨论中国的失衡问题采取相对的观念，即与其他国家的一般水平相比。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其问题。例如，投资占 GDP 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大约为 25%，但中国 35% 的水平或许并不能算太高。因此，在作出判断时也应该考虑诸如投资回报、产能过剩等其他指标。

那么，中国的投资比重的确过高吗？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考虑到中国经济异乎寻常的强劲增长，中国较高的投资率并不过分（Garnaut, 2006）。事实上，一旦中国成功地减少了经常账户盈余，其投资率会更高。

虽然中国的确需要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但中国的投资率从 2000 年的 36% 增加到 2008 年将近 45% 的水平（图 14-1），已经超过东盟国家和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的投资水平。同时，基于 101 个国家经验研究的“钱纳里标准”表明，中国在当前的收入水平下的投资率比标准高出 24%。以上事实都表明，当前中国的投资占 GDP 比重过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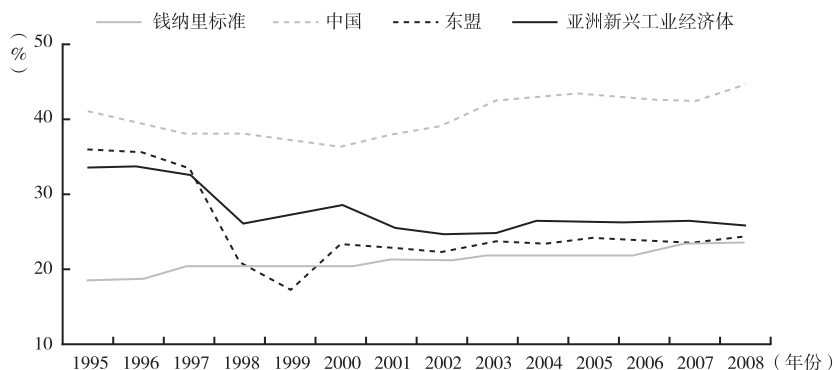


图 14-1 中国，东盟（ASEAN）和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NIEs）的投资占 GDP 比重

注：“钱纳里标准”（Chenery Standard）是基于 101 个国家消费率和国民收入关系的经验研究得到的结果（Chenery and Syrquin, 1975）。

资料来源：CEIC 数据以及作者的计算。

过高的投资率往往增加了经济过热、资产泡沫和产能过剩的风险。虽然东亚经济体素来以强劲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投资率而闻名，但在过去的 50

年里，只有其他 3 个亚洲经济体有超过 40% 的投资率，并且都没有像中国持续这么长的时间：新加坡 80 年代初投资率将近 50%，然而只持续到了 80 年代中期；马来西亚和泰国在 90 年代中期的投资率也一度接近 40%，然而接下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两个国家都经历了重创。

投资占 GDP 比重过高，相应的，消费占 GDP 比重则过低。“钱纳里标准”表明中国的消费占比应该达到 80% 的水平，但实际上大约低了 30%（图 14-2）。从 2000~2008 年，中国的消费占比下降了 15%。没有经济可以只依赖投资而增长，如果持续这样的趋势，中国的经济会面临较大的问题，甚至会变成政治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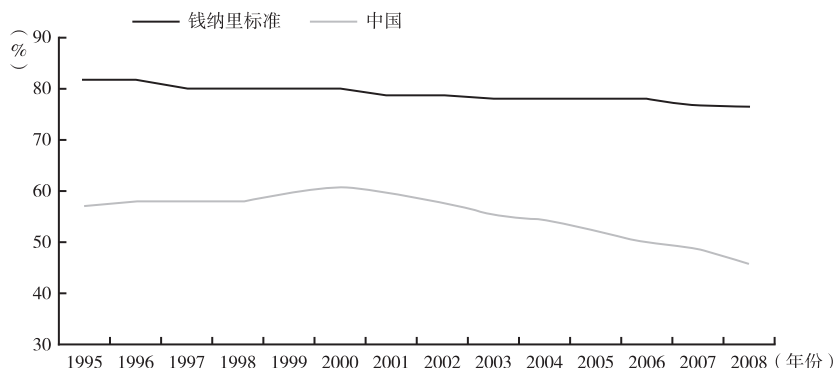


图 14-2 中国的消费占 GDP 比重

注：“钱纳里标准”（Chenery Standard）是基于 101 个国家消费率和国民收入关系的经验研究的结果（Chenery and Syrquin, 1975）。

资料来源：CEIC 数据以及作者的计算。

也许中国的结构失衡问题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其较大的经常账户盈余。2000 年，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只占 GDP 的 1.7%；2001 年，盈余还稍许下降。但随着中国在 2001 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其经常账户盈余开始攀升，尤其在 2004 年之后，盈余占比显著增加。到 2007 年底，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已经达到 GDP 的 10.8%。尽管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2008、2009 年盈余比重有所下降（图 14-3）。但这种下降是暂时的或是永久的，还值得探讨。

较大的经常账户盈余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第一，由于受限于当前的汇率体制，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意味着作为中低收入国家的中国正在借钱给更富裕的国家。第二，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大约 1/3 依赖国外市场，一旦国外市场发生波动，必然会增加中国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最后，大量的经常账户盈余也引起了国外许多国家的不满，并且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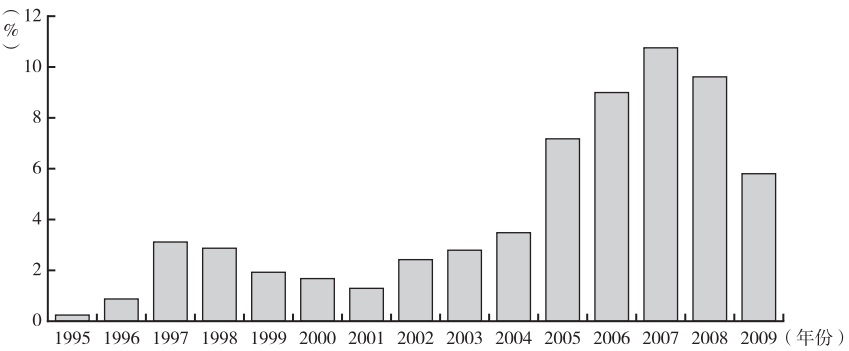


图 14-3 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

资料来源：CEIC 数据以及国家外汇管理局。

能成为保护主义的借口。

根据定义，经常账户盈余等于储蓄与投资之差。东亚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由经常账户赤字向盈余转变的过程中，主要是由于投资的下降（图 14-1）。中国的情况则不一样，从 2000 ~ 2008 年中国的投资率反而增加了 9%，同期储蓄率也增加了 17%（图 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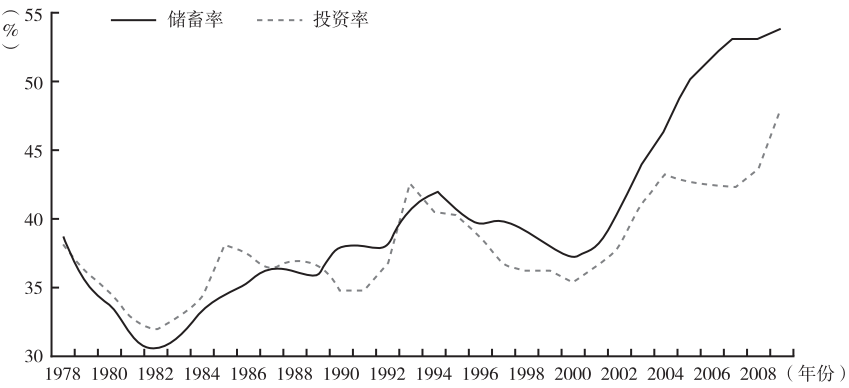


图 14-4 中国的储蓄和投资率

资料来源：CEIC 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

可见研究储蓄行为对于理解经常账户的变化至关重要。21 世纪初，一个共识是，家户是总储蓄增加的重要贡献因素，而家户较高的储蓄则是由于社会保障体系发展落后。但是，这样一个看法正在改变，到 2004、2005 年，分解的数据表明，总储蓄的提高主要是由于企业储蓄的飞快增加（图 14 -

5)。因此,改变企业的储蓄行为,或者加大对企业的征税力度也许是解决中国经常账户盈余问题的有效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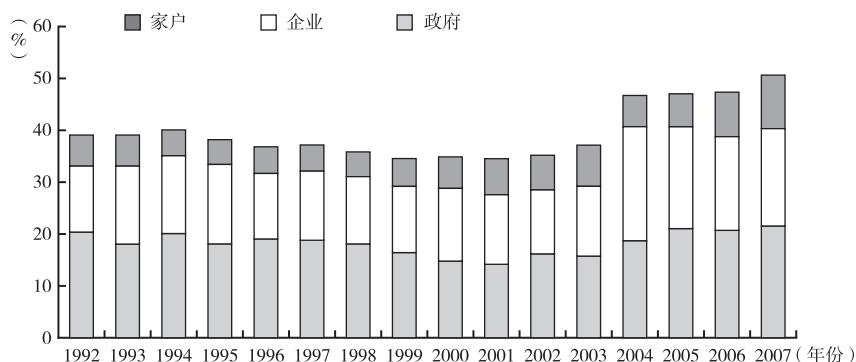


图 14-5 家户、企业、政府对总储蓄的贡献

资料来源:CEIC 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

最近的数据又显示出新的变化:企业净储蓄开始下降,而政府的净储蓄开始上升。家户的储蓄也有上升趋势。

产业的构成、环境的变化也是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另一个重要的表现是收入不均。尽管政府加大力度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但城镇-农村收入比率比却从 1984 年的 1.7 增加 2009 年的 3.3 (图 14-6)。更重要的是,居民的基尼系数从 80 年代中期的不到 0.3 上升到 2008~2009 年的 0.5,这样的水平在世界范围来看都偏高,表明可能会有很大的社会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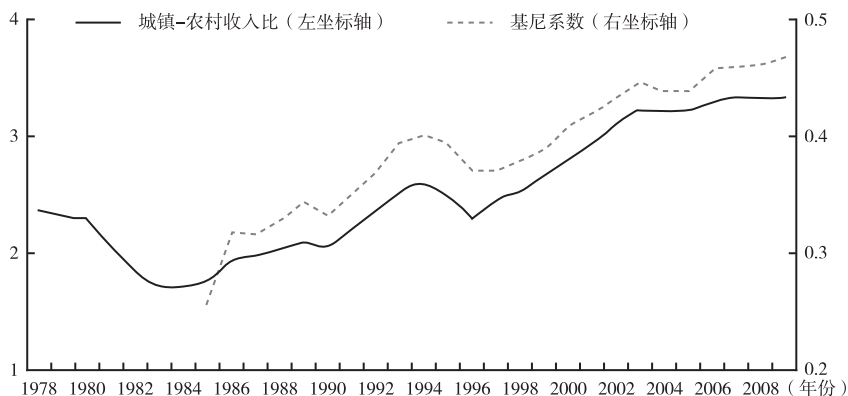


图 14-6 城镇-农村收入比率以及居民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和作者的编辑。

三 过去的政策努力

中国宏观经济表现往往被认为过于平稳，然而，还是有一些周期性的特征。自从 2003 年以来，中国经济至少经历了两个完整的周期。经济在 2003 年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并且在 2004 年出现过热的迹象。稳定一段时间之后，经济又在 2007 年和 2008 年初出现过热现象。到 2010 年初，中国经济已经基本摆脱全球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并且再次呈现过热。

温家宝政府在执政之初就开始强调要解决中国的结构失衡问题（再平衡），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常，宏观调控与经济再平衡政策紧密连接，有时甚至难以区分。但是，当政府要控制经济过热时，往往更重视结构调整。而当需要促进经济增长时，结构调整则常常要让位。

温家宝政府期间的第一次宏观紧缩政策开始于 2004 年。2004 年第一季度，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达到 43%。同时，在食品价格的推动下，消费者物价指数（CPI）逐月上升，到当年的 7、8 月份，已经超过中国人民银行的警戒线 5%。

于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控制经济过热。其中，最重要和直接的是抑制投资，包括提高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行业建设项目资本金比例；核减全国各类开发区 4813 个；从紧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清理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70600 个；停止了江苏常州“铁本”钢铁项目的建设。

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则没有针对特定部门，具体包括：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上调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 0.27 个百分点；放开贷款利率上限；通过“窗口指导”和“信贷配额”降低贷款增速。

由于工业增加值、商业银行贷款额、企业利润增长都表现出下滑趋势，宏观政策在 2005 年初有所转向，人民银行放松了对贷款的控制。

然而，政府试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努力还在继续。一批高耗能、高污染和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落后生产能力被淘汰。钢铁、煤炭、水泥等 11 个行业结构调整的政策措施得到制定和实施。煤炭、电解铝行业分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1.1 亿吨和 120 万吨。2006 年，中央政府还要求各省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 4%、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 2%。

2005 年 7 月，人民银行宣布重启人民币汇改。自 2005 年 7 月 21 日起，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了 22%，实际有效

汇率升值了 16%。

随着紧缩性政策的放缓，2006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再次表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2006 年第一季度，GDP 同比增长 10.2%，新增贷款 12500 多亿元，超过全年计划控制目标的一半。通货膨胀率在 2007 年和 2008 年初也开始回升。这些宏观经济条件的改变促使了新一轮的紧缩政策。

政府首先取消或降低了高耗能、高排放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制定了《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调控从严控制新开工项目的意见》，并再次上调了一些投资建设项目的资本金比例。同时，政府启动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关停 1.12 个分小煤矿，淘汰落后炼铁产能 4659 万吨、炼钢产能 3747 万吨、水泥产能 8700 万吨。

人民银行从 2006 年初到 2008 年初数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并要求金融机构要从严控制基本建设贷款投放。同时，财政部改变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 年第三季度，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从上半年的 16.3% 下降为 12.4%，GDP 增长从上半年的 10.4% 下降到 8.9%。到了 2008 年第四季度，GDP 实际同比增长只有 6.7%，而 2009 年第一季度进一步减少到 6.1%。

面对这样的经济形势，中国政府迅速作出反应。人民银行于 2008 年 9 月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从 2008 年第四季度起，急剧扩大贷款规模，到 2009 年，银行新增贷款总额达到 9.6 万亿元，为年初官方计划额度的近 2 倍。从 2008 年中起，人民币停止对美元升值，管理浮动的制度暂时由盯住美元代替。2008 年 11 月，国务院开始推行包括新增 4 万亿元人民币政府投资在内的一揽子“扩内需，促增长”的政策。从 2008 年 8 月 1 日到 2009 年 6 月 1 日，政府 7 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尤其针对劳动密集型产品）。

同时，中国政府也没有停止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努力。电信、航空等行业重组迈出重要步伐。全年关停小火电 1669 万千瓦，关闭小煤矿 1054 处。环境保护部暂停审批了数个建设项目。

中国政府还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明确提出了 2020 年中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和政策措施。

在这些刺激政策下，中国经济从 2009 年第二季度起开始好转。到 2010 年初，中国政府已经开始考虑是否应该退出扩张性的政策。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使政府重新考虑退出的时机。

作为回顾，我们发现过去六年来，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来

解决结构失衡和增长质量的问题。这些措施中虽然也有汇率、税率、资本金要求等，但大多数在本质上还是行政政策。整体而言，这些政策措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几乎所有的经济失衡的指标都在恶化。

四 要素成本扭曲

为什么在这些政策努力下结构失衡问题却变得日益严重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政策的效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例如，政府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减少个人税收负担来促进居民消费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更根本的解释是这些政策没有触及结构失衡问题的本质原因。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由诸如居民收入、生产利润、投资收益等激励结构所推动的。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当利润超过 100% 时，资本家愿意用性命去逐利。因此，只要投资收益很高，行政手段不足以减少投资活动。

的确，激励结构的扭曲一直以来伴随着中国的改革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GDP 增长举世瞩目。虽然经济学家们对于改革政策的核心有不同的理解，但大多数都认为应该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用自由的市场来代替中央计划体系能够提高经济的配置和技术效率（林毅夫等，1996）。

然而，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并不是一个对称的过程。经历了 30 多年的经济改革之后，几乎所有的产品市场都已经自由化，但是要素市场仍然存在严重扭曲。这种现象几乎存在于所有的生产要素之中，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资源和环境。这些扭曲严重影响了生产者、投资者和出口者的激励结构，应该为日益严重的失衡问题负责（黄益平，2010a；黄益平和陶坤玉，2010）。

劳动力市场扭曲的最明显的例子是户籍管理制度。早些年，户籍管理制度下，劳动力是不能自由流动的。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大量的农民开始涌入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在阻止劳动力流动上不再有效。然而，因为这些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在就业中仍然受到歧视，也无法享受普通城市市民的社会福利。更有甚者，即使做相同的工作，这些农民工的工资只有城市居民的一半，甚至 1/3。

因此，户籍管理制度为城市用人单位歧视对待农民工提供了制度上的途径，这尤其反映在劳动密集型的出口部门上。如果用人单位为农民工购买所有社会福利并且支付与城市员工相同的薪水，中国的出口部门也许就不会像如今这样庞大了。然而，也有一些人认为，如果中国农村存在足够的富余劳

动力，户籍管理制度的去除并不会增加劳动力的成本。

资本市场的扭曲也很明显。中国的金融体系有明显的金融抑制的特征：高度管制的利率、受政府影响的信贷配置、频繁调整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严格控制的资本账户（黄益平和王勋，2010a, b）。早期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金融抑制常常导致一个国家的利率被压低若干个百分点。中国的资金成本被压低的另一个证据是 GDP 名义增长率与长期政府债券收益率之间的巨大差距（常常达到 8% 或更多）。

资本成本扭曲的另一个表现是被低估的货币币值。虽然经济学家们对于人民币被低估的程度有不同的估计，但人民币被低估这一事实却毋庸置疑（Goldstein 和 Lardy，2008）。被低估的货币相对地压低了国内资本的成本，不仅促进出口、抑制进口，同时也促进了贸易部门的发展，歧视了非贸易部门的发展。

土地成本的扭曲并不是很直观。高昂的土地拍卖价格常常占据中国各媒体的头条。然而，这些土地常常是用于房地产开发用途的。工业用途的土地成本非常低。在中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各地方政府常常竞相用低廉的土地使用费来吸引投资。

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价格扭曲随着国际价格的变化而波动。以石油价格为例，国家发改委规定，一旦国际价格波动超过 7%，国内价格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然而，当国际原油价格超过 80 美元/桶时，发改委由于担心提高国内价格会打击生产和消费，所以并没有相应地调整国内价格。

最后，如果把环境也看做一种生产的投入品，由于中国环境保护政策执行得不严格，其成本也是扭曲的。也就是说，生产者（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于其造成的环境污染都没有进行足够的补偿。

需要指出的是，要素成本的扭曲在中国并不鲜见。改革前，中国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这项政策被普遍认为是为了保证农产品的稳定供给。然而，宋国青（1994）则指出这项政策实际上是将农村资源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①，目的是加速城市工业化的发展。

如今，目的也许是类似的。1978 年底，中国的领导集体决定停止阶级斗争，开始经济建设。GDP 增长率逐渐变成评价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最重要指标。因此，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推动经济尽可能快地增长。于是，被压低的要素价格，正如改革前被压低的农产品价格一样，成为促进 GDP 增

① 宋国青的文章中写于 1982 年，那时其还在北京大学读本科。

长的工具。

为了判断扭曲的程度，我们利用了黄益平和陶坤玉（2010）^① 的计算。诚然，这些估计值并不完全科学。然而，我们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计算精确的数据，而是得到初步的图景（表 14 - 1）。估计结果表明要素成本的扭曲在过去 10 年中显著增加，并在 2006 年达到最高点。

表 14 - 1 中国要素成本扭曲的估计值

单位：%

年份	劳动力	资本	土地	能源	环境
2000	0.1	4.1	0.5	0.0	3.8
2001	0.2	3.9	0.5	0.0	3.5
2002	0.8	3.9	0.4	0.0	3.3
2003	1.0	3.8	1.1	0.0	3.3
2004	2.0	3.1	0.9	0.6	3.0
2005	2.4	3.0	1.3	1.7	3.0
2006	2.7	3.1	2.0	1.6	2.8
2007	3.2	3.6	1.2	1.6	2.4
2008	3.6	3.4	1.0	0.7	1.9
2009 *	2.7	3.5	0.9	0.7	1.8

资料来源：黄益平和陶坤玉（2010），以及作者的估计。

估计的结果也说明：第一，资本是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成本扭曲要素；第二，劳动力成本扭曲逐年上升，这一结果是由于市场工资相对于农民工工资更快的增长，然而，随着农民工工资开始迅速提高，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有所改变；第三，能源成本的扭曲波动很大；第四，总成本扭曲已经达到最高点，这表明也许最糟糕的时候已经过去。

这些成本的扭曲相当于是对生产者进行补贴，要素成本的降低，增加了生产利润，提高了投资回报，促进了中国的出口。成本的扭曲使得中国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世界工厂。同时，也因为生产要素便宜，在中国加入 WTO 后，全世界的生产者和投资者都涌入中国。

扭曲的要素成本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更多地促进了出口和投资。而后者则是中国结构失衡的关键原因。事实上，我们对成本扭曲的估计值能够较

① 具体的计算方法请参见黄益平和陶坤玉（2010）的附录。

好地解释中国的外部失衡：快速增长但近年有所减缓的经常账户盈余（图 14-7）。这表明，尽管汇率制度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很重要，但解决经常账户失衡问题则需要一揽子的综合政策措施（Goldstein 和 Lardy, 2009；黄益平和陶坤玉，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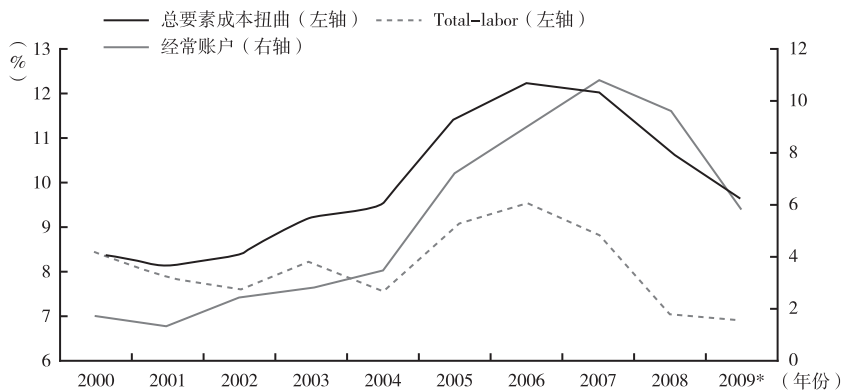


图 14-7 要素成本扭曲与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

注：Total-Labor 是总要素成本扭曲减去劳动成本扭曲。

资料来源：黄益平和陶坤玉（2010），以及作者的估计。

五 结束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举世瞩目。然而，投资过度、巨大的经常账户盈余、低效的资源利用以及环境污染等严重的失衡问题始终伴随左右。过去的 7 年，政府把再平衡经济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之一。但是，结构失衡的问题似乎更加恶化。

这些调整结构的政策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可能是由于时滞，例如，需要多年来提升消费者的信心。然而，这些政策的失效更可能是因为政府过多地依靠行政手段。这些手段可能在短期内有效，但是可能是不准确或不可持续的。例如国家发改委对投资项目的控制：政府为了控制总投资规模会关注那些新开工项目，但投资者却有很多方法避免上报“新项目”。

也有很多时候，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对的，但是力度不够。当经济过热时，人民银行一般会提高利率、收紧流动性。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调整幅度都很小。为了减少外部账户盈余，政府也调整了出口退税率，甚至

使货币升值，但这些调整也很难逆转日益恶化的失衡问题。

本文认为失衡问题的根源在于要素成本的扭曲。而这些扭曲则是由于不对称的市场化改革：产品市场的自由化与要素市场的严重扭曲。这些扭曲相当于是对生产者和投资者进行补贴，增加了企业利润，减少了居民收入。在过去的 10 年里，居民收入占 GDP 比重下降了 10%（白重恩和钱震杰，2009a, b）。这些扭曲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更多地增加了投资和出口。

解决中国的结构失衡问题需要一揽子的综合政策措施。政府应该摒弃其对 GDP 增长的绝对关注，毕竟，GDP 增长只是手段而非经济发展的目的。需要政策措施来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力量，再分配国有企业的利润。

然而，关键的措施还是在于解决要素成本的扭曲问题，完成 30 多年前就开始的市场化改革，让自由市场来决定要素的价格。改革的过程中，要素成本可能上升，从而减缓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却能够获得更加平衡和可持续的增长。

某种程度上，中国政府已经在朝这方面努力。2009 年以来，政府的各部门启动了要素价格的改革，例如调整燃料和水的价格。政府在 2010 年也开始试点户籍制度的改革。金融市场的改革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也可以减少资本成本的扭曲。

完成要素的市场化改革可能需要若干年，例如，由于政府对于土地私有化持保留态度以及担心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土地制度的改革困难重重。然而，本文认为更重要的是应立即着手，逐渐推进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只有这样，结构失衡问题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王碧珺 译）

参考文献

1. 白重恩，钱震杰，2009a，《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2009 年第 3 期。
2. 白重恩，钱震杰，2009b，《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5 期。
3. 温家宝，2006，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会议，北京，3 月 5 日。
4. 姚洋，2010，《调整经济结构，重启改革议程》，《财经》第 5 期。
5. Chenery, Hollis and Moises Syrquin, 1975, *Patterns of Development, 1950 - 197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 Chang, Gordon G., 2001, *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 New York: Random

House.

7. Garnaut, Ross, 2006, Making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ork for the Platinum A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on the Occasion of Angus Maddison's 80th Birthday, 15 – 16 December,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Brisbane.
8. Goldstein, Morris and Nicholas Lardy, eds., 2008, Debating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9. Goldstein, Morris and Nicholas R. Lardy, 2009, The Future of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 Greenspan, Alan, 2005, "Current account," Speech at Advancing Enterprise Conference, 4 February, London, U. K.
10. Huang, Yiping, 2010a, China's great ascendancy and structural risks: Consequences of asymmetric market liberalization,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24, No. 1, pp. 65 – 85.
11. Huang, Yiping, 2010b, Dissecting the China puzzle: Asymmetric liberalization and cost distortion,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 forthcoming.
12. Huang, Yiping and Kunyu Tao, 2010, Causes and remedies of China's current account surpluses, *Asian Economic Papers*, forthcoming.
13. Huang, Yiping and Xun Wang, 2010a,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capital account controls," Project paper prepared for External Economy Institut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Beijing.
14. Lin, Justin Yifu, Fang Cai and Li Zhou, 1996, *The China Miracl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Economic Refor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5. Pei, Minxin, 2006,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6. Song, Guoqing, 1994, "From unified purchase and marketing system to land tax," in Qiren Zhou, ed., *Rural Change and Chinese Development: 1978 – 1989 (II)*,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ese).
17. Yu, Yongding, 2007, "Global Imbalances and China,"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Vol. 40, No. 1, pp. 1 – 33.